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演进与智媒时代新路径

林颖颖, 张舒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近30年来,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从内涵延伸到研究范式均呈现显著变化。媒介素养的概念不断演变、丰富, 从早期聚焦读写能力, 逐步拓展至网络素养、算法素养等新维度。媒介素养研究范式亦经历了一系列转变: 从“保护”转向“赋权”、从“工具”转向“体验”、从“视觉中心”转向“多模态拓展”并呈现“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相应地, 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也逐步从借鉴国外经验转向本土化探索。通过梳理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脉络, 阐释了基于媒介环境和媒介用户视角的底层逻辑, 探讨智媒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新挑战, 提出积极应对社会化媒体发展, 形成复杂传播生态的新路径。

关键词: 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 策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3-0252-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1024609](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51024609)

Evolution of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in China and New Pathways in the Era of Smart Media

LIN Yingying, ZHANG Shu

(College of 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hina's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both conceptual scop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The concept of media literacy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from an early focus on literacy skills to new dimensions such as digital literacy, and algorithmic literac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have shifted: from “protection” to “empowerment”, from “tools” to “experiences,” and from “visual-centricism” to “multimodal expansion” in a trend from “monolithic” to “multifaceted” approaches. Correspondingly,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has progressed from borrow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o localized explor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in China, explains the underlying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a environment and media users, discusses new challenges emerging in the era of smart media,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proactively address the complex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smart media era; strategic approaches

收稿日期: 2025-10-24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C2023248)

第一作者: 林颖颖,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媒介素养研究、新闻生产研究。E-mail: linyinying@usst.edu.cn

随着社会进步和信息技术发展,媒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媒介素养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拓展,新的媒介范式持续涌现,媒介素养研究和教育范式迭代更新。通过查阅知网期刊数据库的11412篇文献,笔者发现,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历经了3个阶段:1994—2003年的引入和启蒙期,相关研究主要介绍国外媒介素养理论及其应用状况;2004—2014年的本土化和拓展期,研究实现本土化转向;2015年至今的智媒化与反思期,研究范式上出现“情感转向”与“多模态扩展”等。

本文将从4个层面即内涵延伸、研究范式、教育实践路径以及研究演进的底层逻辑,分析30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成果,并探讨智媒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实践新路径。

一、媒介素养内涵延伸

媒介素养的内涵伴随媒介技术的演进而持续丰富与深化。探寻其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基础能力到复合型认知框架拓展的路径,其中大致可分为3个关键阶段。

首先,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书本、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被称为纸质媒介时代。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强调“读写素养”,即人们看报、读书、写字的能力^[1]。

第二,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使信息形态更加丰富多样,且在传播速度和范围上也远远超过了纸质媒介。在此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突破了“读写”的单一维度,衍生出多个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分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构建有两类取向:其一为层次化模型,旨在建立一个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素养体系;其二为整合性概念,试图捕捉新媒介生态的本质特征。在层次化模型方面,有研究者通过构建“媒介素养之塔”,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等4个递进层次,并进一步将每个层次的素养学习目标区分为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2]。这一框架不仅细化了素养构成,更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在整合性概念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素养”的提出。该概念在融合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社会性、交互性、开放性网络特质,并勾勒出“认知—观念—行

为”的养成逻辑^[3]。上述研究共同推动媒介素养研究从基础技能转向对媒介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系统性理解。

第三,当我们进入到智媒时代,算法素养成为媒介素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算法的存在,享受由此带来的诸多便利;另一方面,人们也需对算法可能带来的风险保持警惕,具备相应的识别与抵御能力。这促使人们构建一种与算法社会相适应的媒介素养。算法素养的关键在于学习算法思维,打破算法的“黑箱”状态,有效规避算法可能引发的风险。因而,媒介素养教育需突破传统的“保护主义”范式,引导受众在与不同类型算法的交互过程中,逐步学会驾驭算法,实现与算法的良性互动^[4]。

综上,中国媒介素养的内涵研究轨迹清晰地反映了从适应单一媒介到驾驭复合媒介、再到反思智能媒介的认知深化过程,为人们应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媒介素养研究范式转变

(一) 研究立场:从“保护”到“赋权”

在大众传播时代,依据个体与媒介的关系,社会人群可分为两类主要角色:传播者与受众。传播者是经过专业训练并进入信息生产专业机构(即媒体)的社会个体,而绝大多数人则在与媒介的互动中扮演着接收媒介内容的角色(即受众)^[5]。媒介素养保护主义范式认为,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多为低俗文化,有必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向大众揭示媒介及其文化的消极属性,从而引导受众自觉抵制媒介文化的诱惑。这种教育理念既是对高雅文化的维护,也是一种保护受众“纯洁心灵”的措施^[6]。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与“用户中心”传播生态的形成,媒介素养的研究焦点从“防范媒介”转向了“赋权受众”,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的“媒介素养”概念,关注受众在传播活动中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如何实现受众赋权的问题^[7]。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交互性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它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促使人们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变为主动参与信息的创造和传播。这种参与范式超越了传统的保护主义

理念,主张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应转向通过“赋权”给受众,激发其积极参与媒介行为,从而发展受众分析、思辨、传播和自我表达的能力^[8]。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赋权”,受众不仅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使自身的话语权得以释放,还能够深入参与媒介事件的全过程^[9]。

(二) 研究视角:从“工具”到“体验”

媒介素养教育主要脱胎于精英文化,其核心聚焦于培养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这种模式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媒介信息,带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视角。然而,这一视角对媒介情感体验的关注相对不足,忽视了情感、关系等非理性要素在传播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社会化的媒体平台允许人们撰写、分享和评论,从互动交往中得到赋权,成为媒介文化的参与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情绪感染,可能会导致一些不理性行为的出现,这样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判断和行为,还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

基于此,研究发生了显著的“体验”转向。在这种以关系为核心的传播模式下,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护关系的工具。相应地,媒介素养的核心也从信息批判转向情感交往,强调受众在媒介使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互动。这种转变要求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从传统的工具范式转向体验范式^[10]。

在新的范式下,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应借助社交平台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报道活动,通过发布正能量的内容,增强大众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让情感传播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方式和策略^[11]。

(三) 研究范畴:从“视觉中心”到“多模态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电视、摄影等视觉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并普及,人类社会进入“读图时代”,“视觉素养”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焦点。“视觉素养”指应用各种视觉形象参与认知,从而获得搜索、分析、评价和交流信息的能力^[12]。

在大众媒介时代,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大众往往作为传播关系中的“受者”,这个时期的媒介素养的重点在于对视觉文本的理解与批判。

智能媒介的爆发式增长带来了音频、触觉交互、算法流等非视觉形态的普及,固守“视觉中心主义”已无法充分理解当下的媒介实践,研究范式于是出现了“去视觉中心化”或称“多模态拓展”的趋势。大众与媒介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体的媒介实践不再是对原来单一的视觉文本符号的解读,而是情感体验、具身参与、技术赋能融合、多模态的实践模式。有学者主张,研究必须要超越单纯对视觉文本信息的批判性解读,应该关注视觉之外的其他经验在传播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全面地认知个体的媒介实践^[13],去“视觉中心化”。

(四) 研究对象:从“单一”到“多元”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对象早期主要聚焦于青少年群体,议题多围绕电视、网络游戏等媒介形态对其成长的潜在负面影响展开。学者们认为应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14]。随着研究深化,学界开始系统地将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群体,形成了覆盖多个维度、关注不同需求的多元研究格局。

在年龄维度上,研究实现了从青少年向儿童与老年人的双向延伸。儿童过早接触电子媒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导致家长的普遍焦虑。对此,有研究倡导应该树立起一种与时俱进的童年观,在父母、政府、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儿童与媒介“健康共存”^[15],挑战了孩子是媒介效果的被动的受害者的观点^[16]。对于老年群体,研究聚焦于数字鸿沟的跨越路径。除了通过培训班等方式助其成为熟练的新媒体使用者^[17],还需重视“关系”是老年人提升新媒介素养的关键路径^[18]。研究同时认为:需加强数字内容反哺,其中家庭支持和子女文化反哺是关键^[19];要消除老年群体对自媒体的距离感和抵触心理,引导其成为积极的社会参与者^[20]。

在群体特质维度上,研究呈现出对女性和农村受众的关注。女性媒介素养研究强调媒介素养成为女性在参与社会过程中的重要素质之一。有学者对城市女性媒介素养调查后呼吁提升其素养^[21]。而针对农村女性的研究则提出要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开展多样化教育活动等措施^[22]。老年女性则面临老龄化和智能媒介疏离问题,需培养其智能媒介信息获取、评价和创建能力^[23]。农

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亟待加强。有研究发现,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落差源于接触和使用条件差异,但农村青少年积极的接触动机有利于弥补差距^[24]。还有研究认为,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应强调正确认识媒介、掌握获取信息知识方法、辨别过滤负面信息、知晓表达意见途径^[25]。同时,政府要推进媒介环境建设和开展多项教育^[26]。一方面,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要依据其特征制定策略并依靠政策法律保障^[27];另一方面,农民要发挥自身能动性^[28]。

在教育实践维度上,研究形成了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差异化路径。针对中小學生群体,研究强调政府机构、公共媒体、民间组织应通力合作^[29],要着眼于教育学生了解媒介的基本知识,学会辨识媒体信息,尽可能减少媒介的负面影响^[30]。有研究还认为:在学科教学活动中渗透媒介素养教育应成为基本取向^[31];而对大学生而言,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纳入媒介素养教育,在校园媒体中搭建媒介素养教育平台^[32]。面向自媒体时代成长的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重视两种趋势:一是需要干预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社会的“虚拟社会化”趋势;二是针对过度娱乐的媒介观念,媒介素养教育应重归“抵制低水平满足”的逻辑起点^[33]。

三、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创新

在内涵和范式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也经历了从引进借鉴到本土化创新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课程建设结合实践推广的并进模式。

(一) 课程体系建设:从引进借鉴到本土化开发

媒介素养教育是20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渐兴渐进的一种新的教学科目^[34]。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35]。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最初以引进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在于系统分析西方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理念和实践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教育环境的课程实施路径,具体主要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方面,通过学习研究国外语文媒介素养教材的

编写体例,提出我国语文课程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探索本土化的教学方法和途径^[36]。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课程为依托:在教学理念上深化媒介素养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增加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参与;在媒介关系上强调媒介的客观性^[37]。

2004年,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学术论坛举行,对于中国媒介素养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38]。会议倡导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理论,全面促进媒介素养教育。当年的研究论文数量由前一年的15篇增至50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建设也呈现本土化创新趋势。这一时期的课程开发更加注重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实施模式。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采用隐性(将媒介素养课程与基础性学科、德育课程融合)和显性(独立开设媒介素养专项课程)两种模式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教学;第二,注重教材建设的系统性和适应性,开发涵盖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形态的系列教材^[39];第三,开展系统的课程实验与效果评估,通过跟踪调研开发与实施媒介素养课程,对课程内容和实施方案进行界定^[40]。

(二) 实践推广路径: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协同

在课程建设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推广也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推进体系,展现出从单一学校实施到多元社会协同的发展趋势。

首先,学校教育形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推进体系。在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推广方面,很多学校与机构都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一些学者扎根农村进行宣讲与调研,发现农村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很薄弱,于是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41]。大学层面更注重将专业教育与素养提升相结合,通过志愿者服务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向中小学和社区辐射延伸。大学生志愿者向学校所在的社区小学生讲授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指导他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42],出现了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早期实践中“大中小”结对帮扶的优秀案例。

其次,社区层面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也初见成效。研究者以主讲人身份参与社区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开展“讲授+辅导答疑”活动,实现老年

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从“外力推动”到“个体主动”的转变，同步提升“个人权力”与“自我效能感”，促进老年群体构建新的“线上”与“线下”社交圈，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43]。

四、媒介素养研究演进底层逻辑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演进不是孤立的理论自发过程。究其变迁轨迹，我们能看到清晰的底层逻辑：媒介环境的颠覆性变革是驱动研究演进的外在动力，媒介用户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则是引发研究范式更迭的内在核心。换言之，剖析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演进的学理基础，可立足于媒介环境和媒介用户互动的视角。

(一) 演变的逻辑起点

媒介素养研究的逻辑起点，源于不断更迭的媒介技术环境与身处其中的用户之间的动态关系。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以及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

它试图说明人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人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闻的东西提供结构^[44]。

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重大跃迁，都重构了信息传播的秩序，从而对处于该环境中的用户的认知能力、参与方式与社会权利提出了新要求，这便是媒介素养研究议题变迁的根本动因。

与此同时，用户的角色也从大众传播时代的以信息为中心的“被动受众”，历经新媒体时代的“积极用户”，演变为智媒时代的“人机协同主体”^[45]。这一角色转变迫使媒介素养研究的焦点从“如何保护人免受媒介影响”转向“如何赋权使人能够驾驭媒介”，最终迈向“如何在人机共生的环境中保持人的主体性”。环境与用户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演进的逻辑起点。

(二) 演变过程的阶段性划分与分析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演进脉络，反映了媒介技术环境与用户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历程可划分为3个前后连贯的关键阶段，见表1。

表1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演进脉络
Tab. 1 Evolution of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in China

阶段与时间	媒介环境特征	用户角色	研究焦点与范式演进
第一阶段： 引入与启蒙期 (1994—2003年)	传统大众媒体主导，信息流动呈单向、中心化格局。	被动受众	研究处于理论引介阶段，核心是树立“保护主义”分析范式，旨在帮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批判性地辨识和抵御大众媒体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 本土化与拓展期 (2004—2014年)	互联网普及，Web 2.0技术催生交互式平台，信息传播去中心化。	参与式用户	研究实现本土化转向，范式从“保护”走向“赋权”。研究对象从青少年拓展至儿童、女性、农村受众等多元群体，关注数字鸿沟问题。
第三阶段： 智媒化与反思期 (2015年至今)	算法推荐、AIGC成为信息分发的底层逻辑，传播呈现智能化、多模态化特征。	人机协同主体	研究进入深化反思阶段。内涵上强调以“算法素养”为核心；范式上出现“情感转向”与“多模态拓展”，并开始反思技术权力下的赋权局限性。

如表1所示，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演进轨迹呈现出一条围绕媒介环境和用户角色的互动变化而不断深化的清晰路径。在第一阶段，研究聚焦于对外部媒介内容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随着用户参与能力的提升，研究转向对用户主体性的发掘与赋能；到第三阶段，当智能媒介构成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时，研究的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对媒介技术本身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系统性反思与批判之中。这一从“批判内容”到“赋能用户”再到“反思技术”的历程，完整地勾勒出中国媒介素养研究适应时代变迁、不断深化其学理内涵

的演进逻辑。

(三) 演变中的参与主体行为与特征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演进是多主体协同推动的结果，各参与主体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征。

一则，政府与政策机构扮演着顶层设计与推动者的角色，通过制定相关教育政策与法规，为国家层面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与制度保障。我国政府2016年全面启动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其中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是重要内容^[46]。二则,作为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的引擎,高校与研究机构承担了引介西方理论、推动本土化范式构建的核心职能。通过持续的学术研究,这些机构界定了不同时期的研究议程,并从学理上回应了媒介环境变迁带来的新挑战。三则,作为教育实践的试验场与推广基石,学校与社区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课程与活动。大中小学的课程探索、社区的老年数字素养培训等,构成了媒介素养教育落地生根的关键路径,体现了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闭环。四则,作为技术环境的塑造者之一,平台企业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提供的技术平台为用户赋权、参与和体验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其商业逻辑、算法设计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客观上催生了针对算法素养、数据素养的研究需求,推动了研究议题的深化。在上述主体以外,用户作为重要主体,其角色的整体性变迁是驱动研究演进的最根本动力。用户从被动到主动,再到与算法共生的行为模式变化,持续地向学界和实务界提出新问题,促使媒介素养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和深化。

综上所述,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演进是一个由媒介技术环境驱动、以用户角色转变为核心、由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动态过程。对这一底层逻辑的分析,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的研究脉络提供了清晰的学理框架,也为人们思考智媒时代媒介素养的未来发展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智媒时代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对我国媒介素养内涵延伸、媒介素养研究范式转变及教育实践路径的梳理表明,其中的演进逻辑始终回应着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和用户需求以及整体社会需求。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传媒生态重构,同时也带来很多新挑战,对既有的研究共识和实践路径构成了系统性考验。本文前述的内涵、教育实践路径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转变,恰恰点明了当前挑战的核心方向。

(一) 考验和挑战

1. 从“内涵拓展”到“本体追问”

上述研究探索了媒介素养从“读写素养”到

“算法素养”的内涵延伸路径。然而,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涌现,使这一延伸路径遭遇了新的挑战。当内容的生产主体不是只靠“人”,而是“人机协同”甚至是纯AI时,传统媒介素养围绕“谁在传播”“何为真实”建立的分析框架趋于失效。这迫使人们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将“算法素养”作为一个新维度加入清单,而必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追问:在一个人工智能也能“创作”的时代,媒介素养的核心究竟是辨识“信息”的真伪,还是理解“现实”本身的建构机制?这对“媒介素养之塔”的层次划分与“网络素养”的认知基础,都提出了根本性的反思。

2. 从“范式演进”到“范式调适”

媒介素养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保护”到“赋权”、从“工具”到“体验”、从“单一”到“多元”等层级的演进。但智媒时代折射出了这些范式潜在的“失灵”风险。具体表现在四个维度:其一,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赋权范式”可能异化为在过滤泡泡内的有限自主;其二,“体验转向”可能沦为被数据化和商品化的情感劳动;其三,“多元关怀”可能因算法偏见、数据隐私风险而衍生新的数字鸿沟,这表明智媒环境不仅没有消解保护主义范式所担忧的媒介负面影响,反而使其更加隐蔽和系统化;其四,上述“失灵”风险也在挑战赋权范式和体验转向的乐观预设,要求我们在倡导“积极使用”时必须同步嵌入对技术权力的深刻批判,并要求对现有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调适。

3. 从“路径拓展”到“效能提升”

20年来,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展现了从课程到活动、从学校到社区的路径拓展。然而如上所述,智媒技术的复杂性与迭代速度,正急剧放大不同群体间的认知落差与技能壁垒,形成“智能鸿沟”。此前针对老年人、农村受众等群体设计的、侧重于设备操作和基础识读的教育实践,在算法歧视、深度伪造、数据隐私等系统性风险面前,其覆盖能力和保护效能显得不足。那么,既有的实践路径是否能尽快提升效能,以确保所有公民而不仅仅是“数字原住民”,都能公平地、有尊严地融入智能社会?

(二) 应对路径

1. 推进算法素养深度升级

媒介素养的根本是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其内涵及提升路径应随着媒介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更新。智媒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内涵应与传播实践的特征相契合,如媒介素养应对非人类行动者、媒介形式、传播中非理性要素的关注纳入其中^[47]。而智能媒介素养一方面要求用户能有独立思考与信息甄别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在智能媒介实践过程中强化自我保护与主体意识,避免陷入智能媒介所带来的信息困境之中。因此,在大众的智能媒介实践中,媒介素养也应有更多新内涵^[48]。智媒时代的内涵延伸,应聚焦于“算法素养”,并且培养批判性算法思维,即引导公众不仅理解算法的便利,更能反思其社会影响、商业动机与权力结构,打破算法“黑箱”的神秘感,实现从“被动推荐”到“主动驾驭”的转变。

2. 确认范式演进新起点

在动态演变的媒介生态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后果。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框架,即涉及“获取、分析、评价、解释、应用、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已难以全面覆盖新兴的传播现象。当前,无论是传统的赋权范式还是保护主义范式,均难以为智能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有效指导。在智能传播时代,一方面应该以一种新的姿态来思考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也应与时俱进,必须围绕AI素养建立媒介教育的共识,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49]。另一方面,还需要提炼出更高的培育目标,不仅要“保护”受众免受侵害,更要“赋权”使其具备能动性,最终目标是让受众能在复杂、不确定的智媒环境中保持理性、客观。

3. 强化多元主体实践协同

当前大多数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为短期、单一课程,应该加强课程融合,将媒介素养知识、批判性思维和技术运用能力融入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和综合能力提升中^[50]。另外,还应拓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对象的覆盖面。由于老年人、儿童、基层公务员的新媒介能力不足^[51],应加强特殊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打造适幼、适老课程和讲座,

开展基层公务员专项培训。

此外,必须强化多主体协同。特别是在针对老年人、农村受众等群体的教育中,应推动政府、学校、社区与平台企业形成合力,将教育内容从数字技能操作,升级为包含算法认知、数据安全与公民权利在内的综合素养,确保研究范畴的“多元化”能够真正转化为教育实践的“包容性”。

六、结语

回顾中国媒介素养研究30年的演进历程:其内涵研究体现了从适应单一媒介到驾驭复合媒介、再到反思智能媒介的深化过程;在研究范式上,研究立场从“保护”转向“赋权”,研究视角从“工具”转向“体验”,研究范畴从“视觉中心”走向“多模态拓展”,研究对象从“单一”青少年群体拓展至儿童、老年人、农村受众等多元群体;在教育实践创新上,呈现出课程建设与社区推广并进、学校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力的发展格局。未来的媒介素养研究应结合时代特征更新内涵,探索适应智能传播的教育范式。未来的发展路径并非颠覆已有的演进逻辑,而应在内涵上聚焦于算法思维,在目标上侧重于培育数字公民韧性,在实践上致力于构建包容性教育生态。如此方能使媒介素养研究在智媒时代为构建清朗的数字社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

- [1] 李媛. 新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研究——基于量表的开发与验证[D].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2022.
- [2] 卢峰. 媒介素养之塔: 新媒体技术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构成[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4): 129-141.
- [3] 喻国明, 赵睿. 网络素养: 概念演进、基本内涵及养成的操作性逻辑——试论习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好网民”的理论基础[J]. 新闻战线, 2017(2): 43-46.
- [4] 彭兰. 如何实现“与算法共存”——算法社会中的算法素养及其两大面向[J]. 探索与争鸣, 2021(3): 13-15.
- [5] 谷虹. 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嬗变: 内容性媒介、物质性媒介与主体性媒介[J]. 当代传播, 2024(2): 35-40.
- [6] 朱巧燕.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现状分析——以2020年为例[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2(8): 36-40; 80.
- [7] 张开. 媒介素养理论框架下的受众研究新论[J]. 现代

- 传播, 2018, 40(2): 152 - 156.
- [8] 大卫·帕金翰. 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 超越保护主义[J]. 宋小卫, 译.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0(2): 73 - 79.
- [9] 李德刚, 何玉. 新媒介素养: 参与式文化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向[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7(12): 39 - 40.
- [10] 石晋阳, 陈刚. 论媒介素养教育的情感转向[J]. 现代传播, 2016, 38(4): 153 - 156.
- [11] 李庆林, 彭仕亨. 社交媒体时代呼唤情感素养的培养[J]. 青年记者, 2021(3): 44 - 45.
- [12] 王帆, 张舒予. 读图时代的大众素养: 媒介素养或视觉素养[J]. 中国电化教育, 2008(2): 21 - 24.
- [13] 张玉. 超越视觉中心主义: 媒介素养教育的新方向与新路径[J]. 东南传播, 2021(8): 112 - 115.
- [14] 宋小卫. 学会解读大众传播(上)——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J]. 当代传播, 2000(2): 61 - 63.
- [15] 惠慧. 媒体饱和时代童年的“消逝”、重构与媒介素养教育[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8): 63 - 70.
- [16] 戴怡平. 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J]. 青年探索, 2001(3): 6 - 9.
- [17] 丁卓菁. 新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媒介素养教育探讨[J]. 新闻大学, 2012(3): 116 - 121.
- [18] 张大伟, 谢兴政. 农村中老年人提升新媒介素养的“关系”路径研究[J]. 新闻大学, 2022(8): 1 - 16; 121.
- [19] 武晓立. 跨越“数字鸿沟”: 社交媒体时代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升[J]. 青年记者, 2020(25): 16 - 17.
- [20] 刘倩. 自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J]. 青年记者, 2019(8): 26 - 27.
- [21] 单晓红. 城市女性媒介素养状况调查——以昆明市为例[C]//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7): 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论文集. 上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 2007: 441 - 455.
- [22] 凌菁, 陈雨曦. 农村女性媒介素养调查——以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为例[J]. 新闻世界, 2012(8): 201 - 202.
- [23] 赵梦洁, 刘宝瑞. 智媒时代我国老年女性群体智能媒介素养现状的实证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22, 8(20): 113 - 118.
- [24] 牛新权. 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J]. 新闻记者, 2005(4): 52 - 55.
- [25] 路鹏程, 骆杲, 王敏晨, 等. 我国中部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比较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红安县两地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3): 80 - 88.
- [26] 郑智斌, 樊国宝. 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6(3): 158 - 162.
- [27] 李晶.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对浙江金华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现状的实证调查[C]//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7): 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论文集. 上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2007: 269 - 279.
- [28] 彭月萍. 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初探——以井冈山区域调查为例[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1(6): 113 - 119.
- [29] 肖玉清. 加强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9): 103.
- [30] 唐雨桐. 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应处理好几对关系[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9(1): 69 - 71.
- [31] 赵婧. 中小學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紧迫性与策略取向[J]. 教育探索, 2017(2): 41 - 43.
- [32] 王莲华.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思考[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1(3): 108 - 116.
- [33] 曲慧, 喻国明. 虚拟社会化与批判缺失: 代际媒介观演进与媒介素养研究[J]. 出版广角, 2022(8): 70 - 76.
- [34] 宋小卫. 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J]. 国际新闻界, 2000(4): 55 - 58.
- [35] 张楠. 我国媒介教育初探[J]. 彭城职业大学学报, 2002(3): 28 - 31.
- [36] 张帆. 语文课程中的媒介素养教育初探——以美加英等国为主要考察对象[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 [37] 蔺艳茹, 王清, 施勇. 北美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分析及启示[J]. 中小学电教, 2009(4): 37 - 39.
- [38] 张开. 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J]. 现代传播, 2004(6): 105 - 106.
- [39] 袁磊, 周亚娟. 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初探[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08(12): 12 - 14.
- [40] 张洁, 常征, 李健. 媒介素养教育效果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为例[J]. 少年儿童研究, 2009(20): 11 - 15; 10.
- [41] 王天德.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人物史[M].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7.
- [42] 谢静, 陈俊美. 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J]. 当代传播, 2008(1): 84 - 88.

[43] 张文晖. 媒介素养教育的社区实践: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研究——以兰州市 G 社区为例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22.

[44]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5] 陈梁, 符伦瑞, 韩槐志. 新媒介技术重构健康传播: 实践变革与理论演进 [J]. 新闻与写作, 2025(10): 5 – 15.

[46] 黄晓勇. 充分重视智能媒介素养的提升 [N]. 光明日报, 2021-11-19(011).

[47] 张玉. 智媒时代的媒介素养: 内涵延展与提升路径 [J]. 现代视听, 2023(10): 29 – 33.

[48] 董亚飞. 智能媒介素养的新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J]. 中国传媒科技, 2023(8): 124 – 127.

[49] 付玉. AI 素养: 未来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起点与范式重建 [J]. 东南传播, 2022(7): 130 – 133.

[50] 汪天颖. 回溯与展望: 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建构与实践逻辑 [J]. 教育传媒研究, 2024(S1): 51 – 54

[51] 刘阳彤. 基层公务员新媒介素养现状及发展路径探究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6): 78 – 79; 83.

(责编: 朱渭波)